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的主旨是在描繪本論文的梗概，第一節為研究問題與其重要性的討論。在第二節當中我們將探討過去學界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論述。接下來的第三節，筆者將提出本文的研究發現。最後第四節則是研究方法與限制的說明，以及介紹本論文的章節安排。

## 第一節 研究問題其重要性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以驚人的經濟發展和可觀的經貿成長擺脫過去的貧窮與封閉，迅速跟上發達國家的腳步，往現代化的方向持續邁進；然而，在另一方面，走向市場經濟並未動搖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即使面臨接二連三的政治挑戰，中共對於國家機器的掌握與公民社會的控制依然未見消退。透過這些特徵的觀察，吳玉山遂提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概念，他認為中國大陸的發展現象揉合了蘇東和東亞模式，經改上的亮眼表現雖然帶來政治參與的壓力，但共產黨卻能夠有效轉化這些壓力，回應外界挑戰並且持續執政鞏固一黨領導，走出一條獨樹一格的道路。<sup>1</sup>本研究將試圖從政治菁英甄補（political recruitment）的面向來解釋中共如何在維持高度經濟成長的同時，依舊維繫其政權於不墜，對於國家的統治有絕對領導的優勢。

延續一黨專政是中共菁英的政治使命，維持經濟表現可以說是達成使命的最佳手段，因此領導菁英接班人的選拔工作便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在菁英甄補的對象當中，我們發現有一群人與中共「馬列思想」、「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等號召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他們是 1978 年之後出國留學的海歸派政治菁英。領導隊伍中「海歸派」的重要性隨著中國大陸極力投入經濟建設便扶搖直

---

<sup>1</sup>吳玉山，「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和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頁 309~335。

上，海歸派漸受重用的趨勢正顯示這個族群在政壇的勢力已不容小覷的事實。<sup>2</sup>具備國際觀與專業技術能夠有效促進政府行政效率提升施政品質，乃是中共政權極力網羅海歸人才的主要考量。話雖如此，有別於黨內栽培的本土菁英，海歸官員除了外語能力和專業素養備受肯定之外，更特殊的一點是他們曾經接觸西方民主思潮，對於民主理念和價值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涉略，這一點對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維持共產黨領導思想的中共政權而言，自然也可能會構成威脅。

就此觀之，海歸官員的存在於中共強調一黨領導的思維下更顯地獨樹一格，也正是這個緣故，引起我們對留學歸國人才研究的莫大興趣。根據過去東歐的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藉由組織與官僚才能掌握政經體制的運作，<sup>3</sup>換言之官僚系統是共黨權力賴以延續的重要支柱，菁英的篩選、培養與晉升過程所構成的選拔機制更是左右精英來源與特徵的主要關鍵。<sup>4</sup>所以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以政治流動（political mobility）為討論核心，並且以海歸派為例，針對研究問題展開深入的探索。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學術界對於中國海歸派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根據我們的整理後發現關於海歸派的文獻主要著重在人才流動（brain exchange）的討論上，大部分集中在經濟貢獻和社會發展的研究領域。我們在這一節當中，先對於過去學術界在海歸派議

---

<sup>2</sup>例如外交部就是海歸派的大本營，新任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早年不但曾留學英國，更是中南海倚重的「美國通」，前後幾任副部長張業遂、周文重（現任駐美大使）、王光亞（現任駐聯合國代表）也都曾負笈海外。另如主掌中央人民銀行的周小川、教育部部長周濟，以及剛走馬上任的科技部部長萬綱等，都是中國著名的海歸派代表人物。海歸派不但在省部級中已嶄露頭角，在副省部級官員中具有海歸身分的人數也與日俱增。請參閱田曉容，「中國第十代海歸官員登上政壇高層」，**中華僑網**（北京），2006年7月7日。<http://www.chinaqw.com.cn/news/2006/0707/68/35581.shtml>；李梁、董書華，「新一代海歸官員漸擔政壇重任」，**人民網**（北京），2005年4月1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4/15/content\\_2834026.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4/15/content_2834026.htm)。

<sup>3</sup> Xueguang Zhou, "Political Dynamics and Bureaucratic Career Patter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4,"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9 (November 2001), pp. 1036-1038.

<sup>4</sup>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6), pp. 45-52.

題上所關心的焦點進行回顧，緊接著再討論海歸從政的相關發現，最後指出本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人才跨國境的流動現象象徵市場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卻也揭開各國人才爭奪大戰的序幕。人才移動的方向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向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流動，越先進的國家越能吸引全世界的頂尖人才，但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發展中國家因「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狀況日趨嚴重，陷入發展停滯，甚至是發展落後的困境。關於中國大陸海歸派的研究主要有三個討論核心，首先是對於「人才外流」的關注，改革開放後門戶大開，社經環境等差距造成人才不斷大量流失；其次是社經條件改善過程中的「人才回流」情況，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蓬勃發展，就業環境與機會也不斷增加，吸引大批人才返國尋求發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才外流的新定義」的觀點，提出「為國貢獻」（而非狹隘的回國服務）的新思維，簡而言之，就是揚棄傳統狹隘的人才搶奪觀念，不再將人才外流視為淨損失而是潛在收益。接下來我們將針對這三個核心分別進行討論。

1978年改革開放的政策雖然為中國帶來經濟方面的大幅躍進，但依然無法與西方的發達國家相提並論，加上經濟情況改善和政治鬆綁使得有能力且有意願出國留學的人數增加，而且從薪資收入、就業機會、工作條件、研究設施和生活水準等方面看來，中國大陸更是遠遜於先進國家，菁英移民的熱潮便隨著經濟發展的速度不斷升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留學生完成學業後自然會從現實角度去評估返國貢獻與續留發展的利弊得失，所以在這個階段，學者多半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去探討人才流失的原因與其造成的後果。

在「社經條件優劣決定移動行為」的思維下，許多研究者傾向從「推拉理論」的觀點去討論影響人們選擇出國與回國的「推力」和「拉力」。<sup>5</sup>例如蔡恩澤（Enze

---

<sup>5</sup> 研究人才流動的理論主要有經濟學的供需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以及社會學的推拉理論，隨著

Cai) 主張已發展國家經濟科技比較發達，具有良好的研究條件，例如先進的技術設備，自由的學術氣氛，高水準的同行以及優厚的物質生活待遇，發達國家的這種拉力造成留學生傾向選擇滯留海外學而不歸，<sup>6</sup>中國大陸官方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海外移民造成中國人才嚴重流失的現象。<sup>7</sup>「人才外流」已經從單純的「學成歸不歸」演變為一個多元且複雜的重大議題，而且涉及的層面從早期的社會經濟逐漸擴及政治文化。除了「拉力」的評估之外，一般認為來自政治體制的壓抑與牽制所造成留學生的不安，進而構成為影響海外菁英歸國決定的主要「推力」。簡言之，學界傾向將造成「人才外流」的主因歸咎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遲滯。

8

延續前述「社經環境優劣決定人才移動行為」的思維，近年來中國大陸亮眼的經濟表現吸引了全球人才進駐，官方更是不遺餘力地延攬留學海外的優秀菁英份子返國大展身手，這就形成所謂的人才回流（brain gain）的現象。<sup>9</sup>根據崔大偉（David Zweig）等人針對中國人才外流問題的觀察，中國大陸政府在處理人才外流議題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穩定的政治發展促進經濟繁榮，經濟蓬勃發展不但改善社經環境，也提供許多就業機會，加上官方為了招賢納士也不斷推出新的鼓勵回國政策，希望藉由留學人員卓越的才幹將經濟成長推向新的高峰。

---

討論人才流動原因的泛化，推拉理論開始整合經濟、社會、政治，甚至是心理的綜合影響，針對人才流動的行為進行深入的探討。綜合性推拉理論的相關著作可參考田玲，**中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現象研究：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個案分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David Zweig and Cheng Changgui, *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he 1990s*(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5).

<sup>6</sup> Enze Cai,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Scholars' Difficulties in Returning to China,"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vol. 36, no. 4 (July–August 2003), pp. 7–12.

<sup>7</sup> 2007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指出在海外的專業人才數量超過三十萬，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菁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學生甚至有 76% 移居到美國。「海外移民的負效應是人才流失」，**中國青年報**（北京），2007 年 2 月 12 日。http://www.cass.net.cn/show\_News.asp?id=87644&key=人才流失。

<sup>8</sup> David Zweig, "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Politics vs. Economics in China's Brain Dra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1 (Spring 1997), pp. 92–125; Yongqian Wong and Qingyin Zhou, "Returnees,"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vol. 36, no. 3 (July–August 2003), pp. 74–80.

<sup>9</sup> Piset Wattanavitukul, "Hai Gui: The Sea Turtles Come Marching Home," online at <http://www.apmforum.com/columns/china19.htm>; "The New Tide of Returnees,"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vol. 36, issue. 4 (Jul/Aug 2003), pp. 22–46.

<sup>10</sup>同時研究者也發現，在短期之內確實可以靠著經濟走強吸引精英份子回流，但是長期看來，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諸多的不確定性仍是影響人才去留的主因。<sup>11</sup>工商發達、投資進駐所帶來的經濟榮景乃建立於穩定的政治情勢之上，換言之，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政治局勢若常有波瀾起伏，則定會對經濟景氣的穩定發展造成衝擊，接著便會成為左右人才流動的主要因素。

我們可以發現中共近年來的政策逐漸跳脫先前「人才流動與經濟收益」的思考模式，不再拘泥於「人員的流失」等於「國家的損失」的負面想法，反而漸漸接受「儲備海外智力」的思維，也就是說，與其讓人才受限於國內環境學才無用武之地，不如讓他們在國外更完備的條件之下大展身手，這樣強調「人才出國、資訊回國」的正面效益，改善國內對於這些「學而未歸」者的「敵視心態」。<sup>12</sup>除了在留學政策上喊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口號外，也替海外學子「拓寬」了報國之路，官方藉由政策表達新的態度--即使留學生沒有回國服務，也可以透過長短期技術交流、技術指導、項目合作、講學等各種形式的「為國服務」來報效國家。<sup>13</sup>今年（2007年）四月中國社科院發表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出中共雖然還是認為過度的人才外流可能危及國家安全與發展，<sup>14</sup>但也開始嘗試從經濟全球化造成人才國際化的角度來審視跨國境的人力循環（brain exchange），這也反映出中共從經濟成長中建立了吸引世界各國人才的信心，對於本國高知識、高技術留學人員的流動也抱持較開放的態度。<sup>15</sup>

---

<sup>10</sup> David Zweig, "Is China a magnet for global talent?" *Reports on Chinese Returnees*, 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Oct. 2006).

<sup>11</sup> 同註 10

<sup>12</sup> David Zweig and Chung Siu Fung, "Redefining the brain drain: China's Diaspora Option," *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no.1* (Oct. 2006).

<sup>13</sup> 詳細內容可參考「關於印發“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一五規劃”的通知」，**人民網**（北京），2007年1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64300/64302/5301351.html>。

<sup>14</sup> 「中國海外移民情況述評」，**中國網**（北京），2007年4月1日。

[http://www.china.com.cn/node\\_7000058/2007-04/01/content\\_8044053.htm](http://www.china.com.cn/node_7000058/2007-04/01/content_8044053.htm)。

<sup>15</sup> 程希，「關於全球化時代留學人員地位和作用的若干思考」，**中國發展**（北京），2002年第1期（2002年3月），頁55~61；「中國人才外流，擔憂但不必懼怕」，**中國評論新聞網**（北京），2007年6月22日。



社學家和經濟學者在 1990 年代就開始密切追蹤海歸族群的演變與發展，累積了許多精采的學術著作。反觀政治學領域，雖然逐漸出現許多海歸現象的見解與描述，但是尚未建立起系統性的理論，其發展與社經領域相較之下仍處於起步的階段。今日海歸派在政壇的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可以說是走向中共權力核心的「明日之星」，由於學界在這部份的理論建設猶虛，這也更彰顯本文研究議題的重要性，促使我們對於海歸派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索。

歸國人士的蓬勃發展讓我們感覺到海歸派在中國大陸的重要性日漸攀升，他們的影響力也從原本的社會經濟領域擴散到政治思想的範疇。例如有學者將海歸派視為西學的載體，認為他們承載的不只是先進知識與專業技術，當然也可能有西方文化價值，海歸派的出現多少表示西方文化資本在現代中國崛起的事實，與固有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本之間勢必會產生碰撞，海歸派的社會認同也可能會出現矛盾。<sup>16</sup>根據這個思維，學術界也開始對於海歸派是否會促進政治改革進行推論，例如李和就曾分析道，中國海歸派之中明顯以中庸之道居多，會避免和當局硬碰硬而主張體制內改革，包括對黨的合理化改變，建立可以持續發展的法治基礎，先與權力妥協之後再談民主。<sup>17</sup>

寇健文透過系統性的整理分析後發現，中共在海歸菁英的甄補上具有「既重用又防範」的矛盾特色，而這樣的特色乃是「市場經濟」以及「一黨領導」兩個邏輯妥協下所造成的結果。中國大陸近年來為致力於經濟建設，因此大量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9/3/5/10039358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393588>。

<sup>16</sup> Hui Huang, "Overseas Studies and the Rise of Foreign Cultural Capital in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17, no. 1(March 2002), pp. 35-55.

<sup>17</sup> He Li, "Returned Stud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2 (Summer 2006), pp. 5-29.

選拔具有西方留學背景的人才進入幹部隊伍中，但另一方面卻又避免這些海歸菁英進入黨的關鍵部門服務，徹底杜絕外來思想滲透的可能。<sup>18</sup>

另外，李成在研究中美教育交流中發現，海歸人才帶回的技術、經驗和新思想有助中國的成長和發展，但相對而言，海歸派在中國的黨政機構中擔任高級職務的人卻仍然不多。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級官員的海歸派絕大多數是公費留學的人，雖然自費留學生佔留學總人數高達 95%，但這批留學菁英份子在黨和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的比例卻相當的少。<sup>19</sup>雖然如此，出國留學人員所領導的智庫和研究中心，是中國政府和國際學界的橋梁，也是決策高層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窗口，對於決策仍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李成還是樂觀地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海歸派有機會從幕後走向幕前。<sup>20</sup>

### 第三節 研究發現

雖然根據我們的整理發現既有的菁英選拔理論無法對海歸派的政治流動（political mobility）提出完整的解釋，但是我們從派特南（Robert D. Putnam）在政治菁英的比較研究一書中關於菁英甄補的「晉升管道」（channel）的討論獲得啓發，<sup>21</sup>針對其中管道「滲透性」（permeability）的概念加以延伸和調整，輔以從主流觀點總結的經驗，用以解釋本文的研究對象－從政海歸派－政治流動背後所蘊含的意圖。本文歸納出兩個主要發現：

---

<sup>18</sup>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28。

<sup>19</sup> Cheng Li, "Introduction: Open Doors and Open Minds," in Cheng Li, ed.,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0*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pp. 1~24.

<sup>20</sup> 栗德金，「傾斜的版圖與海歸－專訪華裔中國問題專家李成博士」，**華盛頓觀察週刊**（華盛頓），第 40 期（2005 年 11 月）。<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story.cfm?storyid=1150&charid=2>。

<sup>21</sup> 關於菁英甄補最經典的論述是由 Robert D. Putnam 提出，請參考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6), pp. 45~70.

**第一、海歸派發揮諮詢的功能並扮演執行的角色，所以主要集中在學術單位與政府職能部門。**在全球市場的激烈競爭之中，海歸派在政壇上變得炙手可熱，除了前面所討論的技術專長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具備與國際溝通的經驗與能力，在時代的趨勢下讓中共對他們更加倚重。究此，即使可能因為留學西方而受民主的思維的影響，海歸人士作為知識與技術的載體，在經濟成就鞏固政權合法性的邏輯之下，選擇性的開放渠道給海歸派進入便是最佳的選擇。以管道的垂直滲透性來講，身為錄用渠道守門人（gatekeeper）的中共，基於現代化的理由願對海歸人員敞開大門。

**第二、除了在原生系統升遷（出國進修前後皆在同一領域發展）之外，海歸官員於不同升遷渠道間的水平流動，以「政府機關往人大政協」的晉升為主。**中共在任用海歸人員之前，就已經先進行過篩選，所以一個海歸人員最主要的仕途模式就是先在體系內的單位服務，留學歸國後依然返回原生的體系繼續升遷。此外，從滲透性的概念出發，中共為確保關鍵組織的政治菁英思想純正不受污染，黨政系統容許海歸官員在原生體系進出，但是對於其他海歸菁英的開放性可能會有所保留。易言之，身為晉升渠道守門人的中共，對於海歸派還是有所顧慮，所以對渠道間水平的滲透性加以控制以維持某些統治關鍵部門的思想正統性。

國家培養專業的技術官僚有助於發展生產力並且主導經濟政策，所以，經濟表現越亮眼，政權的合法性自然也就越穩固；另一方面，為了保證在意識形態枷鎖日漸鬆綁的今日，共黨組織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依然能夠強而不墜，培養一批能夠對「一黨專政」保持忠貞的權力繼承人更是當務之急。我們可以從海歸派的政治流動看出中共為達成上述兩個目標而留下的顯著痕跡，第一是利用培養人才進修或是招攬海歸人才的方式提升領導階層的水準，這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放寬渠道縱向的滲透性；第二便是限制晉升管道的橫向流動，確保某些關鍵部門不受到西方思想的精神污染，維持一黨領導大權獨攬的有效運作。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在中共的領導之下，菁英甄補對象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服從黨與國家建設的大局，換言之，認同中共的現行體制並且願意為其服務是菁英接班人必須符合的首要標準。與本土菁英不同的是，從個案選擇的角度來看，除了技術層面的專業能力、外語優勢與國際視野之外，曾經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經驗，並且感受過與原生環境（黨管一切或稱黨的領導）有所不同的社會價值正是政壇海歸派成為關鍵個案（*crucial case*）的條件，<sup>22</sup>因為在一黨專政的脈絡之下，有西化背景的海歸派是政治拔擢對象中最有可能產生價值矛盾的族群。因此本文的研究設計是藉由關鍵個案（也就是海歸派）的研究，觀察其中的因果關係，進而對現有的主流說法進行確認或提出修正。為了使研究更具周延性，我們將針對不同留學背景的海歸派進行比較分析，所以在樣本收集方面，除了改革開放後留學歐美為主的「歐美海歸派」之外，本文擬納入中共建政之後派員前往蘇東學習的「蘇東海歸派」以作為對照、豐富研究層次，同時也能藉此更進一步的瞭解海歸族群歷史發展的軌跡。本節將逐步條列進行論文的方法和具體步驟，並說明可能面臨的研究限制與解決之道。

### 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統計分析法為主，深入訪談為輔。透過搜羅中共官方公開的菁英個人簡歷的方式，所整理出的量化資料將成為本研究的最主要的資料基礎。其次，為完整掌握並分析海歸派的群體特性與歷史沿革，本研究也將進行重要「留學政策」和「培訓政策」的文告整理。

---

<sup>22</sup>關鍵個案的運用有兩種不同的意涵：「典範案例」（*paradigm-case*）和「最可能（*most-likely*）/ 最不可能（*least-likely*）」。前者表示被選出的個案最符合理論（*must closely fit a theory*），因此它的意義在於確認理論（*confirm an existing theory*），所以又或稱為範例；然而，後者則是表示最有可能反駁預期推論的個案，也許是最可能符合推論的例子結果卻成為推翻理論的反例，或是最不可能符合推論的例子結果卻符合推論，這類個案的價值在於反確認（*disconfirm*）現有理論或是為既存理論提出修正建議。本文所採用的是後者。請參照 John Gerring,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9~221.

除此之外，國家政策形塑出國留學人員的特徵，本研究希望可以經由留學文告的收集增加本研究的周延性，精確剖析政權發展對於海歸官員流動的影響。因為不少關鍵的過程與資料並非由公開管道所能夠取得，所以深度訪談對於研究資料的蒐集非常重要。為拉近理論與資料的距離，以及清楚掌握海歸人士在當前政壇的發展趨勢，我們也希望藉由與大陸當地具有海外留學經驗的人士交流，進行深入的訪談與對話，盼能為研究帶來新的觀點與研究靈感。由於海歸派對於政權影響的研究屬於黨政範疇，在當地敏感度稍微偏高，所以研究方法還是偏重於統計分析之上，輔以深度訪談以彌補人事資料收集與解釋上的不足之處。

分析步驟方面，第一，**海歸派的定義與範圍**，在台灣我們對於「海歸派」（也稱作留洋派）的定義十分簡單明瞭，意即在海外取得學歷者。然而，我們在收集大陸海歸派的資料時發覺「海歸派」一詞的運用相當浮泛，例如在學術界無論停留時間長短的交換學者或是訪問學人，也會被稱為「海歸派」；或者是接受國家外派，到海外進修培訓者，同樣也可以被視為政治菁英份子中的「海歸派」。結果，他們似乎將所有留學歸國人員都視為海歸派。在我們的研究當中，這樣過於寬鬆的定義除了會膨脹資料收集的範圍之外，更關鍵的一點是無法突顯留學人員「在西方世界接觸民主觀念」的特點。所以在本文的方析過程當中必須先針對「從政海歸派」這一詞（term）給予明確的定義，才能設定研究範疇（reference）以及進行概念的操作（operationalization）。<sup>23</sup>首先，關於「海歸派」標準的劃分：本研究視 1949 年中共建政後，連續出國一年以上（含一年）的留學歸國人員為海歸派，在這個定義下不包含華僑以及短期（一年以下）且多次出國受訓的人士。<sup>24</sup>其次，關於「從政」海歸派的範圍：除了軍方與國企之外，本文的研究領域包括黨政部門（中央和地方）和高校科研單位。中國大陸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除

---

<sup>23</sup> 在社會研究中，將透過明確的定義和指標的建立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實證化的過程稱為操作化。其意義在於使一個抽象的概念定義轉化為一個（或一系列）可供測量的操作性定義，同時也為該概念定義在此項研究過程中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標準。John Gerring,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pp. 35-60.

<sup>24</sup> 關於本研究「海歸派」定義的比較與討論請參考第二章第四節。

了黨政軍等政府機關之外，國企、高校和科研的領導幹部也有行政級別，造成「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狀態，因此我們必須從組織屬性明確和資料取得容易的兩項標準去評估研究選定的範圍。

第二，**人事資料的蒐集**，除了中央發佈的人事任免派令之外，我們也特別著重分析中共官方發佈的檔。首先本研究擬從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的精英資料庫中搜尋所有副部級以上，<sup>25</sup>具備海外留學經歷的官員簡歷，做為量化資料的基礎，接著從中共官方新聞網站、<sup>26</sup>政府組織的官方網站、<sup>27</sup>重要文獻彙編，以及期刊雜誌搜羅海歸官員的學經歷，竭力達成基礎資料的完備。近年來網路資料更新迅速，提供了資料蒐集上方便的管道，這也是本研究資料取得的主要方式之一。第三，透過量化統計的方式，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據資料，以表格和圖示的方式呈現出海歸派的身分特徵，如：職業類別、出國前後的工作屬性、學科偏好，以及留學經歷等。

## 二、 研究限制

本文在研究方法三方面有所限制，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無法直接與研究對象進行訪談。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海歸族群中的從政人士（特別是副部級以上），與一般在工商業界服務或是學術圈發展的留學生大不相同，對於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議題恐將有所迴避，因此一般公務人員接受訪問的機會並不大；此外，軍方體系和國營企業在政治菁英族群中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惟資料難以取得故不在本研究討論之列。其次，研究對象的詳細資料無法完整掌握。由於我們將採取統計的方式進行研究，透過量化分析處理，再進

---

<sup>25</sup>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政治菁英資料庫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

<sup>26</sup> 主要參考的中共官方新聞網站包括**新華社**（北京）[www.xinhuanet.com](http://www.xinhuanet.com)，**人民網**（北京）[www.people.com.cn](http://www.people.com.cn)，以及**中國網**（北京）<http://www.china.com.cn/>。

<sup>27</sup> 主要參考的政府組織官方網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北京）<http://www.gov.cn/>，其中包含政府組織如：國務院與其組成部門、組成機構、地方各級政府等。

行描述性推論（*description inference*），所以需要蒐集足夠的個案，才能提供充分的訊息，進一步做有效的量化統計分析。<sup>28</sup>囿於中共官僚體系龐雜，官方組織升格重組時有所聞，半官方組織多如牛毛更加難以清楚分辨，因此我們無法詳細地掌握每一位副部級以上政治菁英，以及他們的完整學經歷。最後，根據本文的定義，副部級以下的官員並未進入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列，如此一來，相較於廣大的統治階層，我們對於海歸派的觀察只能集中在「副部級」的高層，研究範圍較為局限，除此之外，從時序上看來，留學浪潮始於鄧小平重掌政權之後，我們相信更多海歸官員在學成歸國後尚在副部級之下的職務歷練，相較之下，建國之後的蘇東海歸派早已進入副部級的仕途階段，這都將無法看出海歸幹部整體的發展趨勢。

面對以上的研究限制，解決之道可分別從兩方面改進。

首先，我們雖然沒有辦法直接與從政的海歸人員進行訪談，但仍可以透過間接的方式得到相同的資訊，例如與高校科研單位中的海歸學者深入對談，一樣能夠還原我們在書面資料上無法得知的真實情境。第二，中共大陸副部級以上的職務繁多，從我們所知道的政府機構、共黨組織、高校科研單位之外，甚至還有國有企業、民主黨派以及社會團體。本研究蒐集的對象僅集中在政府機構、共黨組織、高校科研單位，理由很簡單，因為黨和國家的領導組織與政權之間有最直接的關聯，同時，組織架構也比較明確，幹部領導的人事資料相對也比較公開。最後，由於副部級之下的組織眾多、編製龐雜，數量與範圍之大已超出本研究能力所及，而且，副部級以上的海歸高官的發展動態對於海歸派的整體發展趨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副部級海歸官員的研究依然是海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環。

---

<sup>28</sup> David Colli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wo Decades of Change," in Dankwart A. Rustow and Kenneth Paul Erickso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Dynam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p. 9.

若能克服上述限制與困難，預期可以得到不同層次的研究成果。在理論層次上，若後極權發展模式也如實的反映在對海歸派的錄用甄補上，則可為理論彌補實證研究上的不足；其次，在研究主題上，在政治菁英領域中對於「海歸派」尙未有系統性概念的建立，預計可以得到有別於以往的結論，也成為本文不同於其他研究的特色所在。最後，在研究前景上，具有獨特性質的海歸派將會更豐富菁英政治的研究領域。海歸派對中國「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而言究竟是友是敵的問題也浮上檯面：有人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然成為過去，中國不可能再出現像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未來中共將持續一黨專政的領導；當然也有人寄望海歸派能促成民主改革，曾任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的林中斌就曾預測，過去，留學生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台灣以前走過的路，也會在中國出現」。<sup>29</sup>

另一方面，美國不遺餘力的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民主價值」推行至世界各地，因此很多人認為美國是有意識的培養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待其有朝一日返回母國可以宣揚美國價值，利於美國的民主化推行，維持美國的權力，其政策的背後隱含西方國家藉由留學生的培養，來促進中國「和平演變」的意圖。1990年代之後，西方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期待被中共視為幹預中國內政，甚至是企圖推翻共黨領導的「和平演變」，而避免或是防範「和平演變」的心態也反映在政治菁英的選拔任用之上。我們相信中共菁英政治不只影響了未來的兩岸關係，也牽動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化，因此觀察領導高層的演變特徵將有助於吾人知己知彼，更可掌握世界未來脈動，掌握台灣新的立足點。

章節安排方面，本論文預定分為五章，在這一章（緒論）當中我們已經清楚說明本文的研究問題及其重要性，同時也指出在相關領域中對於這個主題的關注程度和研究焦點，並且簡要說明主要的研究發現。由於海歸官員的政治流動是在

---

<sup>29</sup> 魏城，「BBC 透視中國：海歸派沉浮談」，BBC（英國），2002年4月15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930000/newsid\\_1931100/1931128.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930000/newsid_1931100/1931128.stm)。



整個菁英甄補的大框架之下進行的，所以接下來的第二章將彙整中國大陸自 1949 年以後至今的留學生培養政策，以發展歷程劃為「1950 年至 1978 年」，「1979 年至 1992 年」和「1993 年至今」等三個階段進行整理，我們將藉著三個不同時期的政策文告整理來觀察中共的菁英選拔態度如何反映在留學培訓的文告上，並且說明國家發展政策如何影響幹部任用的標準以及最終如何左右留學工作的方針。第三章本研究將回顧中國研究領域中相關的菁英選拔的理論，分別指出它們的重要性與貢獻之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第四章為假設驗證與分析結果，我們將透過資料分析分別檢證本論文所提出的四項假設，接著進一步探求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最後，在第五章的結論中，我們將歸納政壇海歸派有何發展特徵，並且進一步指出這個族群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提出作者的研究心得。